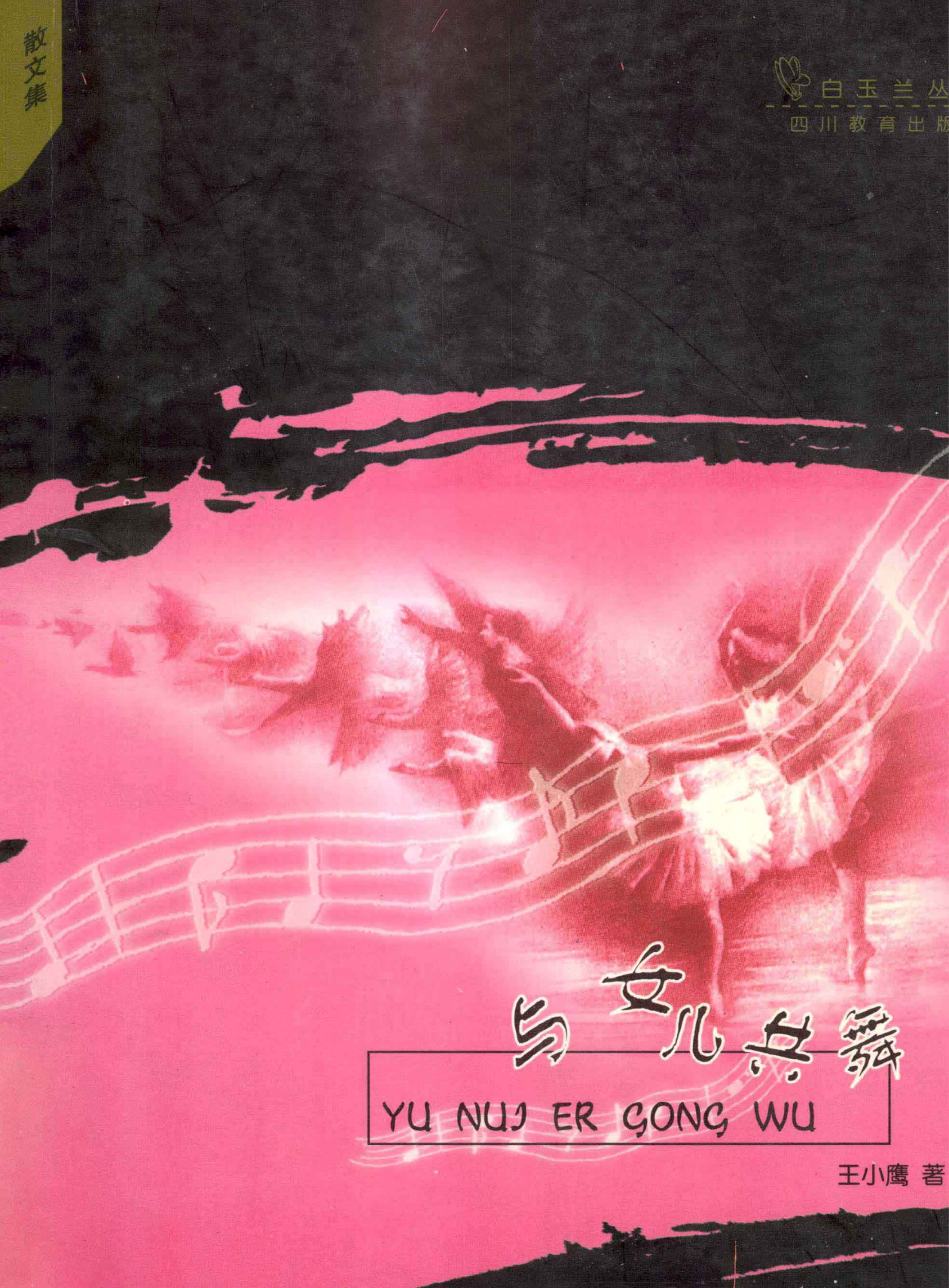




与女儿共舞

YU NUJ ER GONG WU

王小鹰 著



白玉兰丛书

与女儿共舞

王小鹰 著

四川教育出版社
二〇〇一年·成都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与女儿共舞/王小鹰著. —成都: 四川教育出版社,
2000. 9

(白玉兰丛书)

ISBN 7-5408-3492-7

I. 与... II. 王...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 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47147 号

责任编辑: 官 宁

装帧设计: 王 凌 何一兵

责任印制: 李 力

白玉兰丛书——与女儿共舞

出版发行: 四川教育出版社

(成都市盐道街 3 号 邮政编码: 610012)

印 刷: 成都书林印刷厂

(成都市武侯区机投镇东街 42 号 邮政编码: 610045)

版 次: 2001 年 1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书 号: ISBN 7-5408-3492-7/I·39

字 数: 230 千

印 张: 11.5

印 数: 2000 册

定 价: 21.00 元



目

录

第一辑 父亲的微笑 1

父亲的微笑 1

父亲的画集 6

曾经辉煌的平凡 13

她有一颗博爱的心 15

第二辑 山语 33

山语 33

在大山的折皱里舞蹈 37

喜见万竹园 41

并非世外桃源 42

鸟魂 44

第三辑 2000 年我“银婚” 48

2000 年我“银婚” 48



白玉兰丛书

与女儿共舞

女儿没得一百分的时候	51
女儿背书	52
与女儿共舞	53
书的魅力	54
关于朋友	56
心灵的圣殿	57
电视在我家	59
香喷喷的港	61
棒棒学艺记	62
世上只有妈妈好	66
女儿是妈妈的出气筒	70
致少女	72
让母爱博大一些	76
 第四辑 小说在构思之中	 80
小说在构思之中	80
一日光景	83
消失的爬山虎	90
 第五辑 文学之旅	 94
似曾相识雁归来	94
文学之旅	104
天涯客	116
 跋	 180



第一辑 父亲的微笑

父亲的微笑

父亲死得太突然了，给家人及亲朋故旧留下了太多太多的遗憾。父亲开追悼会要张遗照，总希望是正正规规的标准像，却找不到，结果是从一张风景照中剪裁下来再翻拍放大的。父亲正仰起面孔望着蓝天白云，这正是诗人常有的姿态，眉宇间却有些许忧虑——当时父亲作为“走资派”在干校劳动，尚未获得“解放”。追悼会上大家都说这张照片好，比在照相馆里正正规规拍的要好。话又得说回来；谁会在活着的时候正正规规去拍张遗照呢？

为了给父亲找遗照，全家人发动起来把多少年来的旧照片都翻了一遍，无意中翻出了我与父亲的一张合影——父亲坐在一张红木转椅中，双手拢在袖管里，穿的是一袭中式棉袄，带一顶粗呢罗宋帽（照片是黑白的，但我依稀记得，父亲那身棉袄和帽子都是深褐色的），父亲的嘴角微微含着一丝笑意，眼皮却下耷着，使他的面容显得有些疲惫和憔悴。而我却笑得很舒心，坐在父亲身后，一手搭在父亲肩上，身上裹着棉军大衣，头上还戴着棉军帽，挺英姿勃发的样子。背景是四幅山水立轴和一只六七十



公分高的红釉柳叶瓶。

我捧着这张照片一时百感交集，泪如雨下。父亲遽然去世，我的千百种遗憾中有一条便是懊恼自己 32 年来没想到单独跟父亲拍张照，如今真成了“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了。不幸中的侥幸便是找到了这张照片，给我伤痛的心一丝慰藉。

底片却是无论如何都找不着了，不知是 120 的还是 135 的胶片放大了的，肯定不是照相馆里的正规操作，照片边缘有些模糊，整张照片都是灰灰的，看得出是用过了时的药水或相纸操作的，于是我便断定，这张照片一定是叔叔的杰作。叔叔是父亲惟一的弟弟，他在上钢一厂教育科工作，工作之余的爱好就是替人拍照，但他又出奇地节省，照相机是旧货店里淘来的便宜货，显影药水总是舍不得倒掉，用了再用直至显不出影来，相纸也总是去买边角料存着，一直存到过了有效期。尽管如此，我们家的大多数照片还都是出自叔叔之手，所以我们家的旧照片大都是灰不溜秋的。于是拿了照片去问叔叔，这是什么时候拍的你还记得吗？叔叔举着照片看了片刻，笑道：“这不就是小鸥头年从北京探亲回来时照的吗？”经叔叔一提醒，我的记忆便鲜活起来。小鸥是 1972 年考入总政文工团赴京的，如此算来，这张照片便是摄于 1973 年的春节期间了。

小鸥是我的妹妹，五姐妹中她居老三。据母亲说，小鸥刚出生时漂亮得像个洋娃娃，许多人向母亲讨这个女娃，说你上面已有两个姑娘了，这个就送给我吧。母亲当然不肯将亲生骨肉送人，父亲更是最宠爱她。小鸥七岁那年，父亲特意买了架钢琴送给她，这在二十世纪 50 年代末还是很稀罕的呢。当时我们家住在瑞金路上的卜邻公寓里，对门住着翻译家傅东华，傅东华的女儿是音乐学院的教师，每天早晚都有流水般的琴声从他们家里淌



出来。父亲便让小鸥跟着傅家女儿学琴，傅家女儿正好也是排行老三，我们都喊她三娘娘的。小鸥跟三娘娘学了两年琴便考进了上海音乐学院附小，三年后又进了上海音乐学院附中。

1972年，小鸥从音乐学院附中毕业，当时想要进音乐学院深造那简直是痴人说梦，父亲母亲都是“走资派”，这一点就足以判定我们姐妹的命运。一些文艺团体招生也都没有小鸥的份，正是山穷水尽疑无路之时，适值解放军总政文工团来上海招生，小鸥抱着一线希望报了名。招生的负责人是位有点年岁的军人，军人就是不同凡响，一听小鸥的父母曾经都是新四军战士，一拍大腿说：“什么走资派不走资派的，新四军的后代我们部队不收谁收？”便一锤定音，小鸥做梦似地被总政文工团录取了。那年我已在安徽黄山茶林场落户，父母写信来告诉我这个喜讯，我也是兴奋得彻夜难眠。“文革”开始以来由于父亲母亲的问题，我们早已习惯了周围人们的白眼和冷淡，然而人世间毕竟有正义在，有真情在。

1973年，春节期间，我和小鸥恐怕是约好了一起回上海探亲的。我另外一个妹妹老四小花是在全椒插队落户，必定也回来探亲的。那时大妹妹小凤是在纺织厂做挡车女工，小妹妹小燕中学尚未毕业，那一年春节应是全家团聚了，团聚总应该是欢乐的，可是现在怎么都记不起当时欢乐的情景了。“文革”那段日子留给人的记忆大都是苦涩的，有一年春节，父亲关在隔离室里不能回家；还有一年春节，我是到崇明“五七”干校探望母亲的……1973年这个春节为什么我说应该是欢乐的呢？其实我仅是从我跟父亲的这张照片中我的表情推断出来的。

照片中的我穿着簇新的棉军大衣，一手搭着慈爱的父亲，笑得很甜很舒心。在大山中苦干一年，回家来跟父母团聚，看到父亲母亲身体还算健朗，自然会很开心，这是一。当时年轻人对参



军都很向往，记得二妹小凤为了参军，咬破指头写血书要去黑龙江军垦农场，最终因政审不及格而未被批准。三妹进了总政文工团，我们家出了个军人，春节前夕，里委会小组长送来了一张红彤彤的“光荣人家”的条幅，说是允许我们贴在大门上，这对我们家来说确实是件大喜事呀，这是二。再仔细想想，我是1968年到黄山茶林场去的，至1973年已是四个年头了，对于农村的辛苦劳作已经习惯，心情已不像刚去时那般阴郁忧闷，何况那年我已开始尝试写作，先是给农场文艺小分队写节目，我们农场文艺小分队的节目还参加了农场局的汇演，如此想来，那一年我回家探亲时心情恐怕是会开朗许多的了。姐妹们天各一方，一旦相逢，必定欢喜，有说不完的悄悄话，大家必定轮流着试穿小鸥的棉军大衣，暂且过一把瘾。我想，也许我穿了棉军大衣，戴了棉军帽，走到父亲跟前，让父亲看看我像不像个军人。那一刻叔叔肯定也在场，便笑道：来来来，我给你们拍一张。于是便有了这张珍贵的照片。当时为什么其他妹妹没有穿上棉军衣跟父亲合影呢？为什么母亲没加入这张照片呢？大家都记不清了，连叔叔也说不出个所以然了。那个想象中应该是欢乐的场景便掩埋在岁月的长河底下了。

然而我是幸运的，偶尔的一张照片留下了我与父亲在一起的那个瞬间，而且我脸上的笑容是那样的满足，必是我品尝到了合家团聚的天伦之乐？可是……？为什么父亲的面容会显出疲惫和憔悴？或许是五个女儿都聚齐了，嘻嘻哈哈叽叽喳喳，闹得他烦了累了？不，绝不会的。我知道父亲是非常爱我们的，奶奶有时埋怨母亲只生女儿不生儿子，父亲便会笑道：“五个女儿最好，五朵金花五千金嘛。”早些年，父亲很忙，总是外出采访或到什么地方去体验生活，我们很少见到他，“文革”开始后，除了隔离审查和下干校，他在家的时间反倒多了。有空，他喜欢和孩子们



在一起游戏聊天，听我们天南海北地讲农村、工厂、部队和学校里的种种大道小道新闻。记得他从干校回来，绘声绘色地把猪如何吃食如何拉尿如何睡觉的形态描摹给我们看，令我们捧腹大笑（他在干校的饲养班劳动）；他还用夸张丑化的姿势将造反派教他们做的“斗私批修”操演绎出来，嘲问道：“你们也做做看，是否私心就会斗光啦？”父亲是个真正的艺术家，性格热情纯真，他怎么会厌烦他亲爱的女儿们呢？再细细揣摩，父亲那一年是53岁，正值壮年，按常理，应是他的思想最成熟，他的艺术生命力最旺盛的时期，而自“文革”以来，他和千千万万个艺术工作者一样被剥夺了创作的权利。那个年代，在所谓的革命风潮胁迫下，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个人命运像洪水中的一颗泥丸，时而被抛至浪峰顶，时而被沉没入波谷底，一眨眼或许就被淹没了！父亲心中肯定郁积着许许多多的愤懑和委屈，以至于在和亲爱的女儿们团聚之时都无法将内心的苦楚掩藏得干净。看着照片上我的明朗的笑容和父亲疲惫的面容，两者形成的反差像一把利刃刺痛着我，使我时时地自责：那时的我真是幼稚懵懂得可笑，也是二十五六岁的人了，却一点不体谅大人们的心情，只顾自己傻大姐似地笑！每次从农场回来探亲，总是我啰啰嗦嗦把自己的苦恼和希望说给父亲听，而父亲总是用他艺术家诙谐而带哲理的话语为我宽心，为我出许多点子，鼓励我在逆境中自尊自爱自立地生活。我总是贪婪地汲取父亲对我的关爱，却不懂得问问父亲有些什么烦恼，说些宽慰的话让父亲的心稍微轻松一些，让父亲的面容稍微舒畅一些。后来，我从农场回到了上海，在机电设计院做描图工；后来，我结婚了，搬到公婆家去住了；后来，我考上大学了……这一步一步走过的路，父亲一直是我的知心朋友和良师。我却是太自私了，依赖着父亲宽厚而有力的肩膀，只顾着自己向前走啊走啊……突然有一天，父亲不堪心理重负地倒下了，



再也没有睁开他慈爱的眼睛，任我们五个女儿喊哑了嗓子，父亲他听不见了。可是在他听得见的时候，我们却没有许多时间来陪他说话，我们总是以自己个人的前程为重，忙东忙西。倘若我们能多抽一点时间回来陪陪父亲，跟他谈谈他的诗歌他的画画他的苦恼他的希望，或许，父亲的心情会豁然许多；或许，父亲就不会突发脑溢血而过早地离开我们了！

这是我不可饶恕的过错。

父亲，将来有一天，我们在天堂相会，我一定用全部的时间陪着你说话聊天，为你排忧解难，那时我们再拍一张照片，你一定会笑得明朗，笑得舒心的。

1997. 8. 18 追记

父亲的画集

这是父亲在他短短的 59 年生命中留下的惟一的一本画集，况且是在他死后方才面世的！

对于父亲来说，这是遗憾呢还是欣慰？

不堪回首 20 年前的那个可怕的日子，父亲突发脑溢血去世，没有给我们留下片言只语。书案上，砚池里还蓄着他新研的一泓墨；枕头旁，他临睡前翻阅的《诗人玉屑》还不及合拢；他惯常用的那只缺损的瓷杯里，新泡的茶尚有微微的余热。

那一段日子，我们全家人被巨大的悲痛淹没，被父亲遽然去世的谜团纠缠，已经失去了正常的思维。

终于有一天，我擦干眼泪面对残酷的现实，着手整理父亲的诗画遗稿，因为我听到了父亲在冥冥之中焦灼的呼喊。如醍醐灌顶似的，我醒悟过来，对父亲最好的纪念不是眼泪啊！

那是 1979 年的初春，正是乍暖还寒的季节。



在父亲一大堆遗稿中，我突然翻到了它们——那些从战争年代的炮火中幸存下来、保存了将近40年之久的素描、速写和木刻，它们许多只有巴掌大小，纸页都已经泛黄发脆，然而那笔触、那线条却仍是遒劲生动，鼓胀着激情和蓬勃的生命力。我小心翼翼翻阅着它们，那纸张在我手中发出轻微的窸窣声，我仿佛触摸到父亲蹦跳的心，我仿佛看到远久的战火纷飞的年代，父亲文弱的身影，他背着粗帆布制成的画夹，在行军的马背上，在激战后的弹坑旁，在宿营的老百姓的草屋中，稍有空暇，他便掏出手指长短的炭笔，不停地画呀画呀。母亲告诉我们，当时的战争环境非常艰苦险恶，但父亲的情绪却总是那么饱满、热情、乐观。

父亲的骨灰盒是由他的忘年交、画家戴敦邦先生设计的，由整块红木雕成，盒盖似一翻开的诗集，书页上镌着几句父亲的诗句：“别让岁月的马车丢下我们/别让时代的齿轮超过我们/我们要踏着岁月的马车/扬着闪电的鞭子/推动着时代隆隆地前进/这就是我们的最大幸福！”骨灰盒的四周镂刻出缠枝梅花的图案，正面镶嵌着父亲的一页小照，并镌有唐云老先生手书“诗人芦芒千古”的字样。似乎已经盖棺论定，父亲是一个豪放的诗人，短短的一生，他留下了九本诗集。然而，亲人和他的挚友都了解他，他还是一个画家，而且画画比写诗早了许多年。只是在他的有生之年，他的画从未被结集出版，仅在亲朋好友中流传。

父亲出身贫寒，但那并不妨碍他从小就酷爱艺术，追求艺术——艺术的精神便是心灵的解放与自由。父亲曾带我去上海的老城厢寻觅他少年时代居住的小屋，那是人家灶披间后面拦出的一角，仅一片西瓜瓢般大小，塞进一张床就没有多少空余了。我仿佛看见少年父亲跪在床沿，伏在奶奶那只红漆斑驳的旧被柜上，借着人家灶披间昏黄的灯光，开始了他最初的艺术实践。父亲十



几岁时就在报刊上发表画作补贴家用，后来他就替人抄笔记、管理图书，从而得以免费进入新华艺专进修画业，得到了正规的西洋绘画基本功的训练。当时父亲最仰慕德国伟大的艺术家珂勒惠支的作品。抗日战争爆发，民族存亡之际，父亲只身离家投身抗日烽火。他路经浙西来到安徽泾县云岭新四军驻地，从此他便以画笔为武器，活跃在大江南北抗日根据地。母亲说，那时候，根据地的老百姓老老少少都唤他“小胡子画家”。在那漫长的战争岁月，父亲制作了数以千计的画作，得以保存下来的仅是其一小部分。母亲当年用一只铁盒装着父亲的画稿，行军打仗，走到哪带到哪。每逢敌人大扫荡，便将铁盒埋入土中；敌人一走，再启出来。而在十年动乱中，父亲母亲先后都进了“牛棚”，他们将一部分画稿藏在废弃的壁炉里，这才幸免遭劫。

全国解放之际，父亲在华东海军画报社工作，他曾以部队画家的身份出席了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后来父亲转业，却因种种原因被迫改行到作协工作。

1962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江苏解放区画选》，其中选了父亲十来幅素描和木刻。陈毅将军为这本画册题词：“反映江淮战场情况十分真切，艺术家的努力值得我们感谢。”1964年，父亲的老首长张爱萍将军来上海，他看了父亲的素描和木刻，认为这些反映当年苏北抗日根据地斗争生活的画作不仅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而且具有社会价值和历史价值，提议应该予以出版。然而亦因种种原因，父亲的画作依然困于那只铁锈斑斑的铁盒内，未能面世。

1979年的炎热的夏天，我扛着装满父亲画作的小皮箱独自北上。为了出版父亲的画集，我曾四处奔波，屡屡碰壁。当时正是严冰初融，百废待兴之际，要出版一本画集真是很难很难，何况父亲在社会上的身份是诗人而不是画家。终于，北京人民美术



出版社的社长邵宇先生给我们家来了热情洋溢的信，人民美术出版社决定出版父亲的画册！邵宇先生是一名出色的画家，也曾是一名坚强的新四军战士。我们全家对他的感激之情是无以言表的。

在北京工作的三妹和三妹夫来火车站接我，三妹夫扛起小皮箱疑惑地说：“怎么这箱子这么重？”待到住地，妹夫扛皮箱的肩膀竟磨出一道血痕。父亲的画作真是很重很重，或许因为其间负载着太多的愿望和期待？

我还要感谢人民美术出版社的美术编辑姜旗先生，他为父亲的画集倾注了满腔热情，并且是他悄悄地向我交了底：“现在人民美术出版社积压了好多老画家的画集，要是按部就班地排队，不知要排到猴年马月呢。你们能自己抓紧把底片冲洗出来，我瞅机会帮你们往前插插队。”1979年的夏天，空调还是很罕见的。我和三妹钻进人美出版社蒸笼般的暗室里冲洗放大父亲画作的照片，身上的确凉的短袖衬衫都像从水中捞出来一般。大约花了三四天工夫，终于将近200张照片都洗印停当，这才安心，方觉人已经焐得发馊了，一口气连吃了十几根冰棍，直吃到肚子痛为止。

这以后便是年复一年望眼欲穿地等待，等到第五个年头，1984年的春天，父亲的画集终于出版了！

画集的封面是父亲的一幅垂柳老牛图，烫金的“芦芒画集”四个字是张爱萍将军的手迹，张爱萍将军是文武双全的儒将，有很高的艺术鉴赏力，一手字写得刚柔相济，神采奕奕。作序的亦是父亲的老首长李一氓和王阑西，“芦芒同志是我们共同战斗过和熟悉的一位老同志，老战友，他战斗的一生所走过的道路，是我们大家都共同经历的那充满希望、光明而又艰难崎岖的道路。”由于他们对父亲人格的深切了解，故而他们是父亲艺术作



品的知音：“广阔的生活画面，在芦芒同志的作品中到处都给人以强烈的感染力。那在雷雨交加的茫茫荒原上的夜行军，那在火光烛天的敌人据点里的街垒战，那男女老幼围坐一桌的冬学课堂，那人忙马叫高堆粮垛的丰收场，那用简陋帐篷搭起的前线医院，那锤声叮咣紧张繁忙的敌后军火工厂，那军民合作抢收庄稼的麦田，那贫苦农民闹翻身斗地主的会场，这些当年在抗日战争中革命军民战斗生活的真实场景，都一一记载在芦芒同志的笔下。其实，芦芒同志也就是这些生活画面中的一员，他所画的不仅是他所看到的，而且有些也正是他所做的；他不仅在画别人，而且甚至可以说有时也在画他自己。创作和生活结合得那样紧密，几乎到了不可分离的地步……这些作品既是一幅幅耐人品味的美术珍品，也是一卷卷感人肺腑的革命历史回忆录。它之所以至今仍令人爱不释手的艺术生命力正在这里。”

我一遍又一遍地阅读着父亲的画册，跟随青年父亲的脚印穿过皖南的崇山峻岭，然后渡江北上，到达水网交织的苏北平原，并辗转周折于盐阜地区，之后又渡江南下……一个在贫困和歧视中挣扎的苦闷的青年，渴望光明，渴望有自由挥洒艺术才能的地方，一旦他投身于人民大众火热的斗争生活，呼吸到革命队伍中平等自由的空气，他的心灵的枷锁解脱了，热血沸腾，激情澎湃，艺术创造力便如火山爆发般迸溅出来。难怪几十年岁月尘埃仍遮不住这些巴掌大小纸页泛黄的画作中蓬勃的生命力！

画集的第一部分是木刻与版画。有一时期，父亲在根据地的《江淮日报》工作，每天要给报纸作一幅配合斗争形势宣传的木刻，晚上，他伏在草棚中的木板上，就着油灯，刻呀画呀，直至鸡啼天明。画集中选了三幅抗币的木刻，那时候根据地的印刷条件艰苦，无照相制版设备，印纸币只能用木刻印刷。1948年父亲创作的解放南京的石版画，当时没有光石版，父亲硬是用砂子靠



双手在毛石版上磨出来。我很喜欢作于1941年的那幅“向敌人腹背进军”的画，仅10×7公分窄小的画面却展现了千军万马的气势，以刀法娴熟而刚劲的线条，疏密相聚、阴阳相对，勾勒出狂风暴雨之夜，雨夜中天地混沌，隐隐约约可见一支逶迤蜿蜒的队伍正急行军插向敌人的腹背，你仿佛能听到充溢天地间滚雷一般蹦蹦跳跳、答答答答，交织成一片的脚步声马蹄声，感受到那一种赴汤蹈火的昂扬斗志。

与父亲的木刻版画相比，我更喜欢他那些在激战间隙、行军途中和寻常日子里即兴作下的素描，灵动的笔触、鲜活的形象、更率直更性情，水淋淋是从生活的海洋中掬起的。那一幅陈毅将军的画像惟妙惟肖，特别是画出了陈毅将军大敌当前却胸中自有百万雄兵的安详自若的神态。这幅像作于皖南事变之后，当时陈毅将军刚就任新四军代军长。画像在报上刊登出来，极大地鼓舞了广大新四军指战员与革命群众的斗志。其他如“陈毅粟裕同志在指挥部研究开辟根据地计划”、“皖南教导队的政治课”、“敌后大生产”、“长征干部给文艺工作者上课”、“敌后兵工厂”、“反扫荡战斗动员”、“前方医院”、“各界人民参议会”、“土改斗恶霸地主”、“解放区劳模大会”、“渡江支前民工一家”等等，革命根据地方方面面的生活几乎无一遗漏地在父亲笔下栩栩如生地描画出来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于1945年的那幅“解放两淮重镇淮安城”，画面也只有15×12公分大小，黑压压的古城门缓缓地打开了，老百姓箪食壶浆，欢笑着簇拥着来迎接子弟兵进城。此前攻打淮安城时，父亲参加了“敢死队”，和战士们一起冲锋陷阵，冒着枪林弹雨，奋勇登上了淮安城头。此刻，硝烟尚未散尽，父亲顾不得抹去额上的汗珠，就坐在城头废墟上，掏出画笔刷刷地画开了，画下了这淮安人民热烈欢迎子弟兵进城的盛况。



父亲的素描中有许多肖像，父亲善于寥寥数笔便勾勒出一个人的身份特征与性格特点，如“老游击队员”、“新四军战士”、“小号手”、“苏北小丫”、“贫农女娃”、“贫协委员”、“船老大”、“儿童团员”、“房东大娘”、“支前妇女担架队队长”等等，其中有一张“烽火中诞生的小鹰”，画的便是一岁半时的我。人在三岁以前有没有记忆？然而我看到这幅肖像，便依稀记起了那清粼粼的射阳河，我在河边的蒿草棚中出生，那时正值国民党大举进攻解放区，形势危急，母亲生下我后得了伤寒症不省人事，父亲星夜骑着马沿着河滩追寻我们母女俩的踪影……父亲画这幅“小鹰”时已是一年半之后，局势已渐渐好转，“小鹰”回到了父母身边，部队马上就要横渡长江解放全中国。“小鹰”一定感受到了爸爸妈妈们迎接胜利的喜悦之情，所以她不吵也不闹，很乖很安详。

父亲除了作画、刻木刻，还做雕塑，画集中选登了两幅父亲雕塑的照片，一幅是父亲设计并雕塑的“淮北解放区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另一幅是战斗英雄林茂成的头像。父亲是奉张爱萍将军之命参加设计修建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工作的，父亲亲自参加了反“扫荡”战斗，亲眼目睹战友们壮烈牺牲，他怀着满腔悲愤和不尽的哀思进行艺术的创作，从设计到铸浇、施工……他都亲自参加，和那些木工、浇铸工、石匠同住一个草棚，同吃一锅糙米饭，雕像竖起来了，他和工人们抱头痛哭，又开怀大笑！

父亲的这些诞生于战争年代的作品，技法纯净而精到，没有丝毫矫揉造作谄媚媚俗之态，也没有半点遮遮掩掩追名逐利之心，故而我以为它们是当之无愧可称作为艺术的。

父亲画集的后半部三分之一的篇幅，收集了他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开始创作的国画作品近40幅，这些作品中绝大部分画的是牛，在父亲有生之年的最后几年中，他画的牛已经饶有名气